



The Grand Canal and Text-Voice Resonance: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of an Emotional Community in the “Zuili” Cultural Sphere of Jiashan

Yulin Yao

Jiashan Guangbiao School,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3604846740@qq.com

How to cite this paper: Yao, Y.L. (2026)

The Grand Canal and Text-Voice Resonance: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of an Emotional Community in the “Zuili” Cultural Sphere of Jiashan.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3: e15938.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5938>

Received: August 23,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8,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ext-Voice Resonance” (wensheng gongzhe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describing the cycle by which an affective utterance passes repeatedly between written and oral form and enlarges its body of respondents, and uses it to examine how the “Zuili” cultural sphere of Jiashan was linked to the affective network along the Grand Canal. The synchronic axis addresses the structural homology of affect across places, examining how bereft ministers, aggrieved women, palace attendants and travellers stationed along the canal-and-post-road corridor drew on a shared vocabulary of dispersion, and how Zuili entered that structure through the anthologizing work of the Zuili shixi. The diachronic axis addresses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taking the chain that carried the Kuaiji woman’s wall poem at Xinjia Station from ink on plaster to a literati manuscript, to re-inked plaster, to a post-clerk’s recitation, and finally to a printed shihua, as evidence of how a text survives the lapse of communicative memory, and showing that what joins Wu Zhen’s reclusion, Yuan Liaofan’s morality books, the melancholy of the Liuzhou ci school, and the performance of baojuan and field songs is the long resonance of the paired vocabulary of goodness and reclusion. The paper argues for a holistic conception of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that integrates written and oral transmission.

Subject Areas

Psychology

Keywords

Text-Voice Resonance, Ganying (Sympathetic Resonance), The Grand Canal,

1. 引言

清初诗人施闰章于顺治十三年受命提学山东，道经新嘉驿，于《螭斋诗话》中记其见闻，谓“驿在滋阳县北四十里，池台古柏，剧有幽致。驿后土壁，故会稽女子题诗处。诗传于世，而驿壁字无存者。余至询之，有老驿卒秦登科年七十矣，能诵其诗”[1]。这位会稽女子姓名不传，冯梦龙《情史类略》仅记“不知何许人”[2]。其生于万历末年，江南才女而远嫁燕客为妾，一夕受辱，深夜潜至驿站后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序中自陈其愿曰“庶知音读之，悲余生之不辰，则余死且不朽”。题壁于驿站，用意在于召唤远方与后世的知音读其诗、感其情。此后百余年间，为其题诗唱和者踵武相继，明人可考者逾二十家，历清而未歇，上自袁中道、钱谦益、冯梦龙诸名家，下及无名的过往行旅，一诗遂由一己之哀吟，演成一场绵延百年、横贯南北的情感应答[3]。

一位素不相识的薄命女子的悲声，何以能够穿越地域的阻隔与世代的更迭，在四百年间不断唤起陌生人的应和。可以从两处入手。其一在媒介，这段文字在墙壁、抄本、口诵、诗话、总集之间反复改换形态，每一次改换都换来一批新的读者。其二在通道，这些改换发生在明清南北往来最密集的一段路线上，题壁的墙面属于驿站，驿站又处在运河与驿路共同构成的南北通道之中。本文提出“文声共振”这一分析概念，用以刻画情感话语在书面与口头之间往复流转的循环，并循共时与历时两条线索，考察嘉善“携李”文化圈如何借这条通道与运河沿线的情感网络相连。

文声共振所指的循环是一段情感话语在书面与口头两种存在形态之间反复往返，每一次往返都经由可指认的中介者之手，并使其应答者的数量与分布有所扩大。判断一条链路是否构成文声共振，要看其一，可辨识的情感内核在往返中大体维持稳定。其二，每一次形态转换都有可考的经手人，抄者、诵者、编者、演者皆属之。其三，转换的结果是可及范围的扩张，而不是同一群人内部的重复。鲍曼与布里格斯的“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刻画话语脱离原初语境、凝为可独立流通之物，“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刻画其嵌入新语境而生成新义[4]；西尔弗斯坦与厄本所编论文集把这一机制展开为话语的“自然史”，考察同一段话语在不同场合被摘出与再嵌的具体形态[5]。这一路数的分析单位是单次转换。文声共振要处理的是同一段话语上反复叠加的多次转换，以及书面与口头互为来源又互为归宿的回流，其分析单位是整条链路及其累积效果。埃勒斯特罗姆的媒介模态理论提供的是媒介之间何以能够互相转换的类型学条件[6]，属静态描述；文声共振追问这些转换在具体的交通网络与时间序列中是否实际发生、经由何人发生。罗萨的“共鸣”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衡量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品质，其反面为异化，落点在个体的生活质量[7]；文声共振是描述性的，衡量的是文本与声音之间

的传递关系，不涉及主体自我效能的评价。至于“感应”，它属于研究对象自身的解释框架，题壁者、赓和者、宣卷艺人据以理解自己的行为，文声共振则属于分析者的范畴。两者不能互相替代。把“感应”直接当作解释，等于以对象的自我叙述充作论证；把它弃置不顾，则无从说明这些人何为相信一面土墙上的字能够召唤远方与后世。

“感应”以天人合一为根基，视天地万物同禀一气，故能同类相动[8][9]。《周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0]言同类之物超越空间而相互感召；《太上感应篇》“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11]与《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则言因果之报及于后世。空间的一面与时间的一面并存于同一套观念之中。至于“情感共同体”，本文取罗森宛因的界定，指共享同一套情感评价标准与表达规范的人群，其边界未必与家族、乡里或阶层等既有社会集团重合[12]。这正是运河沿线彼此不相识而以同一套语汇应答的题壁者与赓和者。

本文所论材料的作者、本事或传承地须可系于嘉善及其所属的嘉兴府域。“携李”为嘉兴古称，郡邑总集《携李诗系》所辑者与嘉善一县之人事同属一个可考的行政与文献单位，故可合并考察。诸例之间须存在可考的辑录、改编或人事关系。长春姐的和诗由平湖沈季友辑入《携李诗系》，是辑录关系；袁黄既撰善书又主笔万历《嘉善县志》，其书所倡因果报应又为后世宣卷所演，是人事与改编的双重关系；吴镇以草书自题渔父词于画幅之上，诗、书、画共处一纸，是同一文本的跨媒介并置；嘉善田歌的谐音双关上承南朝吴声歌曲，中经冯梦龙《山歌》而下衍，是语法的转写。书面、图绘、口头三类各有代表，方能检验共振是否跨媒介成立。

2. 情感结构的跨地域同构

所谓共时，指情感结构在不同地点之间的同构，即分处运河沿线各地的人以相近的语汇与相近的自我指认安顿相近的处境。会稽女子题壁诗自万历末至康熙间的百余年唱和，兼有两种性质。唱和者分处南北，是空间上的同构；唱和之事前后绵延百年，是时间中的传播与接受。会稽女子的题壁诗，字字皆离散之写照。其云“银红衫子半蒙尘，一盏孤灯伴此身。恰似梨花经雨后，可怜零落不成春”；又云“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袁中道道经新嘉驿，见壁诗而泫然，为作《题会稽女子诗跋》并和诗三首[13]。钱谦益继之，和袁中道之作，有“零落风光哀怨人，银钩玉筋一时新。可怜和墨半行泪，也作邮亭十丈尘”之句[14]。会稽女子“以泪和墨”，钱谦益以“可怜和墨半行泪”应之，一唱一和历历分明。

应答之声更远播于千里之外。嘉兴长春姐《和会稽女子驿亭》有句云“青灯此夕怜孤影，何事天涯不泪垂”[15]；畹兰女士《悼会稽女子》有句云“多情况有千秋月，夜夜墙头照墨痕”[16]。二人与题壁者素不相识，亦未曾亲见其壁，所凭者惟抄本与传录，却借同一壁诗彼此应答，各以自身之飘零映照他人之飘零。同类的哀吟沿这条通道星罗棋布。曾为弘光宫女的秦淮女子宋

蕙湘，十四岁被虏北上，行至汲县而题壁，有“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别故庐”之句；弘光西宫才人叶子眉流亡北地，题壁于宜沟店，有“马足飞尘到鬓边，伤心羞整旧花钿”之句。汲县、宜沟诸地俱在卫河一线，卫河为运河河北段御河至南运河一系之所经，河道与驿路并行。

这些应答者的社会位置各不相同。长春姐在《携李诗系》卷三十四中题为“嘉兴人，黄氏婢”，畹兰出自士人之家，宋蕙湘与叶子眉出自南明宫廷，袁中道、钱谦益则是仕宦文人。使他们能够彼此应答的，是一种共同的位置，即被迫迁移而不能自主返回。明人和诗中有以“自古孤臣怨妇，异地同情”为题者，这八字把上述同构点破为一种可以互换的自我指认，孤臣以怨妇自况，怨妇借孤臣之语自陈。李惠仪研究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学，指出女性的流离经验在这一时期被广泛用作士人表述家国之痛的语言[17]；高彦颐则指出十七世纪江南女性的写作本身已形成跨越家户的交往圈[18]。运河沿线的驿壁，是这一互换与交往得以发生的物质场所。

施闰章记新嘉驿“在滋阳县北四十里”，其地为明代兖州府所属的陆路马驿，故址在今山东济宁市兖州区新驿镇。它不在运河河道之上，距会通河济宁段数十里，处在河道与驿路并行的通道带内。明清南北往还多由运河舟行至济宁一带登陆，再循驿路北上，水驿与马驿彼此衔接，共同构成一条水陆复合的通道[19]。袁中道北游、钱谦益赴京、施闰章之提学山东，皆行经此带。运河沿线的城市因这条通道而成为士人交游、结社与刊刻的节点，文本的流通依托的正是这类节点之间的往还[20]。题壁诗被反复读到，凭借的是通道上稳定而密集的人流。流动性研究指出，流动总须依托固定的“系泊点”(moorings)方能持续，码头、闸口、驿站即属此类[21]。驿壁是系泊点上的一面书写界面，它把过路者短暂的停留转化为可以累积的文字。

“携李”一地被纳入这一情感结构，其枢机在于文本的辑存。长春姐的和诗被平湖人沈季友辑入《携李诗系》。此书汇辑嘉兴一郡自汉迄清的诗作，朱彝尊序称其“虽曰一郡诗林，是又千秋文献资也”[22]，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谓其“多表彰节概之士”[23]。一部以表彰忠节、存录乡邦为职志的郡邑总集，将一位嘉兴女子应和北地题壁的哀音收入其中，嘉兴一郡的文献秩序由此与运河沿线的情感网络接通。合山究研究明清女性题壁诗，指出怀才不遇的男性文人对遭际相似的薄命佳人极易生同情[24]；魏爱莲对十七世纪女性才学交往的研究则显示，此类文本的流通高度依赖士人家族之间的书信与刊刻网络[25]。落魄文人的仕途失意、遗民志士的家国之痛、离散女子的飘零之苦，在这条通道上共用一套语汇，构成一个跨地域的情感共同体。

3. 文本与语汇的世代传递

历时之维上要处理的是同一批文本如何跨越世代而不坠，以及同一组价值语汇如何被后世反复取用。前者可以会稽女子题壁诗的传递链条为例，后者可以“携李”一地善与隐的用法为例。题壁诗的墨迹存世不久。万历四十六年陶奭龄见之尚完好，天启元年李盘至则“字痕湮灭不可识”，赖好事者早有抄本，李盘购得一册，“依旧痕，用墨新之”，其后“和者如云”；此后墙壁数经剥落乃至为俗子毁去，至崇祯十三年黄周星过此，“壁间女子之诗

已觅不得”。物质的驿壁归于湮灭，诗则另循他途存续。顺治、康熙间施闰章询之于老驿卒秦登科，秦氏年七十而能诵其诗，施氏据以录入《蠖斋诗话》。

壁上墨迹先转为士人抄本，李盘据抄本重新描摹上壁，是书面回流为物；驿卒以记诵保存，是书面转为声；施闰章据口诵录入诗话，是声复归书面。每一次转换都有可指认的经手人，也都带来一批新的读者，李盘描壁之后“和者如云”即其明证。这一往复构成文声共振的完整一周。文本的分头存续同样可考。冯梦龙《情史类略》以通俗类书之体收录其事，使之进入市井读者；徐钊《本事诗》后集收畹兰之作；沈季友《携李诗系》收长春姐之作。三种性质不同的编纂物各取一段，同一事件遂在互不重叠的读者群中分头存续。

文化记忆研究中，阿斯曼区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前者依赖活人口传，其存续通常不逾三四代人、约八十至百年[26]；万西纳进一步指出，活态口传与远古记忆之间有一段记忆稀薄的中间地带，称之为“漂浮的空隙”，凡落入其间而无所附丽者，终将随亲历者的凋零而湮没[27]。自万历末至施闰章访，恰当三四代之交，秦登科年七十而能诵，其所诵得自更早一代驿卒，交往记忆正在耗尽。施闰章把口诵录为诗话，等于在记忆行将落入空隙之际将其转入文化记忆。诺拉称此类承担记忆之责的实体为“记忆之场”[28]。就本例而言，驿壁湮灭之后，其位置由文本接替。

“携李”文化之肌理，可以崇文、尚善、水乡三者括之。据康熙《嘉善县志》，嘉善初置县所辖六乡，迁善、奉贤、思贤三乡之名即带“善”“贤”二字[29]；元徐硕《至元嘉禾志》所载嘉禾诸乡，更有劝善、积善、崇德、履仁、慕化等名[30]，其地崇善尚德之风由来已久。就水乡而近隐逸者，同出嘉善魏塘的元四家吴镇最为分明。吴镇号梅花道人，终身不仕，相传其曾祖曾与抗元之役，家世累积着对异族统治的疏离。有元一代江南士人仕进无门，渔隐遂成画中常题，而吴镇《渔父图》最为典型。他喜以秀劲草书自题渔父词于画上，诗、书、画三美一体。其一曰“目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另一首曰“西风潇潇下木叶，江上青山愁万叠，长年悠优乐竿线，蓑笠几番风雨歇”[31][32]。“江上青山愁万叠”把易代之痛化入水乡烟波，而以“乐竿线”“风雨歇”作结，愁绪终归于渔隐的澹泊。“渔父”本是词调之名，源出唐张志和《渔歌子》，吴镇借之题画，使离散之情、隐逸之思与水乡之境在诗、书、画三种媒介之间往复转换。

明清之际，同一地域的取向转向了“善”。袁氏一族本为建文遗民后裔，靖难之变中因与忠于建文帝者往来而遭抄家、流亡吴江，至了凡始复籍嘉善[33]。袁黄万历十四年成进士，十六年授宝坻知县，在任四年，上疏请减宝坻旧额赋役，自江南引耐盐碱稻种试种，撰《宝坻政书》《皇都水利》《劝农书》诸种，又主笔万历《嘉善县志》。他还是《嘉兴藏》最早的倡刻者。该藏刻场设于径山，而以嘉兴楞严寺为总发行所，刻成之经由江南水道分发各地。一部由嘉善人倡议、以嘉兴为集散、循水路流通全国的大藏经，是运河水系承担文本流通的直接实证，也说明这一地域的书面生产从一开始就与南北水道相系。《了凡四训》立论奠基基于感应的因果逻辑，云谷禅师点化之核心一语曰“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其“祸福无门，唯人自招”直承《太上感应篇》，全书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统摄善恶报应[34]。

与袁氏同时而稍后，柳洲词派于国变之后由花间一转而为悲凉。其盟主曹尔堪本嘉善人而寄籍华亭，顺治十八年因江南奏销案罢职归里，此后云游四方，自谓“北抵秦晋，南涉荆楚，中历荆洛海岱之间”，晚岁息影南溪，好友劝其复官，慨然道“六十老人岂复梦金马门哉”，遂以《南溪词》寄其漂泊半生的萧瑟[35]。曹氏罢职之后的南北行迹，所循仍是运河一线，其词中的漂泊之感由此有了具体的路线可按。

把上述数例径直串为一条善德与隐逸的连续脉络，会掩去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吴镇之隐是个体的退处，其取向近于道家，画上题词不言果报，亦无劝惩之意。袁黄之善以功过格量化善行，回报指向科名与子嗣，是一种可计算的现世交换，与吴镇的澹泊自守分属两种价值。曹尔堪的退居出于罢黜，是被迫而不是选择，《南溪词》的萧瑟近于遗民悲慨，与劝善无关。后起的宣卷与田歌，其所演果报兼有信仰与娱乐两重功能，而田歌《五姑娘》以一桩爱情悲剧为本事，其伦理指向是对礼法的抗议。可以成立的说法要弱一些。善与隐在这一地域反复被取用，构成一组长期可用的语汇，每一代人面对各自的处境，从中各取所需，并按当下的需要重新配置其含义。吴镇取“隐”以安顿易代之痛，袁黄取“善”以经营可计算的现世回报，曹尔堪取“隐”以承受罢黜之后的失路，宣卷与田歌则把“善”与“报”下移为村镇厅堂的听觉经验。

语汇的再动员有赖口头传统的世代演唱。嘉善宣卷以当地方言演述，上手主唱、下手和卷，交叉击节，所演多为劝善与因果报应之属[36]。欧大年与白若思对明清宝卷的研究指出，此类文本兼有宗教教化与说唱表演两种属性，卷本与演出互相塑造[37][38]。袁了凡书面的善书与流播嘉善的口头曲艺，一以文字、一以声腔，把同一套因果报应的说法分头输送于雅俗两界。嘉善田歌亦然。其擅以谐音双关抒情，上承南朝吴声歌曲，《西洲曲》“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39]以“莲”谐“怜”、以“清”谐“情”，中经冯梦龙《山歌》的接续而流衍至今；代表作《五姑娘》以清咸丰年间嘉善洪溪塘东村的爱情悲剧为本事，采十二月花名体，领唱者先出“主头歌”，众人以虚字垫词相接，如“落秧歌”一段唱“二月杏花白洋洋，那杨金元屋有五姑娘”。芬尼根论文字与口头的关系，指出二者不是隔绝的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传统内部彼此供养的两种技术[40]。宣卷与田歌年年演唱、代代相传，把前代的善德与哀情一次次重新激活于当下的厅堂田畴之间。

4. 结语

“文声共振”描述的是情感话语在书面与口头之间反复往返、并在往返中扩大其应答者的循环。会稽女子题壁诗的传递提供了这一循环的完整实例，从壁上墨迹到士人抄本，到重描上壁，到驿卒记诵，再到诗话刊本，每一环皆有可考的经手人。共时之维上，分处运河与驿路沿线的孤臣、怨妇、宫人与行旅共用一套离散的语汇，其位置的同构使彼此的应答成为可能，“携李”一地经《携李诗系》的辑录而进入这一结构。历时之维上，同一批文本跨越三四代人的记忆断层而存续，善与隐的语汇则被本地不同世代反复取用、反复改配。二维交织，织就一个以运河与驿路为通道的情感共同体。

这一结论于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直接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每以单一项目为单位，书面文献的整理与口头技艺的传承分属不同类别、遵循不同逻辑，彼此缺乏关联。已有研究强调大运河作为线性活态遗产，其价值须在物质与非物质、历史与当下的整体关系中把握[41]。《携李诗系》《了凡四训》与吴镇渔父图所代表的书面、图绘遗产，与嘉善宣卷、嘉善田歌所代表的口头表演遗产，是同一组情感语汇在不同媒介中的显现，割裂其一，另一者的意义亦将残缺。嘉善田歌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保护若只作曲艺项目办理，则与《携李诗系》一类文献的整理各行其是。值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之际，嘉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宜转采一种统合书面与口头的整体性策略，既系统辑录与研究书面文献所承载的地方情感与善德谱系，又切实扶持宣卷、田歌一类口头传统的活态传承，并以运河与驿路构成的通道为纲，将嘉善的地方记忆置于沿线共时与历时的情感网络之中加以观照。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26 年嘉善县社科研究入围课题“文声共振与地方认同：嘉善携李文化圈口头－书面传统互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1] 施闰章. 螭斋诗话[M]//何庆善, 杨应芹, 点校. 施愚山集. 合肥: 黄山书社, 1992.
- [2] 冯梦龙. 情史类略[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 [3] 张伟, 王占一. 运河驿站诗与明清社会文化——以新嘉驿女子题壁诗为例[J]. 东岳论丛, 2024(10): 14-20.
- [4] Bauman, R. and Briggs, C.L. (1990) Poetics and Performances a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 59-88.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an.19.100190.000423>
- [5] Silverstein, M. and Urban, G. (1996) *Natural Histories of Discours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 Elleström, L. (2010) The Modalities of Media: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Intermedial Relations. In: Elleström, L., Ed., *Media Borders, Multimod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Palgrave Macmillan, 11-48.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275201_2
- [7] Rosa, H. (2019) *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Wagner, J.C., Trans., Pol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6)
- [8] Le Blanc, C. (1985)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The Idea of Resonance (Kan-Yi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9882201798>
- [9]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10] 周易[M]//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1] 太上感应篇[M]//正统道藏(影印本).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 [12] Rosenwein, B.H. (2006)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3] 袁中道. 珂雪斋集[M]. 钱伯城,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4]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钱曾, 笺注. 钱仲联, 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5] 嘉兴市图书馆(编). 携李文系选辑[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4.
- [16] 徐鉉. 本事诗[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7] Li, W. (2014)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ttps://doi.org/10.1163/9781684170760>
- [18] Ko, D.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1503622401>
- [19] Brook, T. (1998)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ttps://doi.org/10.1525/9780520924079>
- [20] Meyer-Fong, T. (2003)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1] Hannam, K., Sheller, M. and Urry, J. (2006) Editorial: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 *Mobilities*, **1**, 1-22. <https://doi.org/10.1080/17450100500489189>
- [22] 朱彝尊. 曝书亭全集[M]. 王利民, 等, 校点.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 [23]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4] 合山究.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M].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7.
- [25] Widmer, E. (1989) 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0**, 1-43. <https://doi.org/10.1353/late.1989.0003>
- [26] Assmann, J. (2011)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Wilson, D.H.,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996306>
- [27] Vansina, J. (1985)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j.36106057>
- [28]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https://doi.org/10.2307/2928520>
- [29] 杨廉, 郁之章. 重修嘉善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补编·浙江府县志辑(第 20 册).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
- [30] 徐硕. 至元嘉禾志[M]//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1] 毛沛定. 渔父清歌——吴镇和他的《渔父图》[J]. 老年教育(书画艺术), 2012(7): 4.
- [32] 陈高华. 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
- [33] 酒井忠夫. 中国善书研究[M]. 增补版. 刘岳兵, 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34] 袁黄. 了凡四训[M]. 尚荣, 徐敏,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35]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 [36] 车锡伦. 中国宝卷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37] Overmyer, D.L. (1999)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ttps://doi.org/10.1163/9781684170319>
- [38] Berezkin, R. (2017) *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0295742533>

- [39] 郭茂倩, 编.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40] Finnegan, R. (1988) *Literacy and Orality: Studies in the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Basil Blackwell.
- [41] 秦宗财, 杨郑一. 中国大运河文化表征与传播创新研究[J]. 中原文化研究, 2021, 9(3): 67-73.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大运河与文声共振：嘉善“携李”文化圈共时历时的情感共同体建构

摘要：本文提出“文声共振”这一分析概念，用以刻画情感话语在书面与口头之间反复往返、并扩大其应答者的循环，据以考察嘉善“携李”文化圈与大运河沿线情感网络的联结。共时之维处理情感结构在不同地点之间的同构，考察分处运河与驿路沿线的孤臣、怨妇、宫人与行旅如何共用一套离散语汇，以及“携李”一地如何经《携李诗系》的辑录进入这一结构。历时之维处理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以会稽女子新嘉驿题壁诗自壁上墨迹、士人抄本、重描上壁、驿卒记诵至诗话刊本的传递链条为例，说明文本如何跨越交往记忆的断层而存续，并指出吴镇的渔隐、袁了凡的善书、柳洲词的悲慨与宣卷、田歌的演唱其间的连续性在于“善”与“隐”这组语汇的长久共振。全文主张一种统合书面与口头的整体性地方文化遗产观。

关键词：文声共振，感应，大运河，情感共同体，口头－书面传统，共时与历时，地方文化遗产